



文化传播与 文明对话

跨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论集

伍鸿宇……
●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本项目获北

合国际学院科研基金资助



文化传播与

文明对话

跨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论集

伍鸿宇……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传播与文明对话：跨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论集/
伍鸿宇著.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11

ISBN 978 - 7 - 5361 - 6006 - 4

I. ①文… II. ①伍… III. ①文化交流 - 中国、西方
国家 - 文集 ②东西文化 - 比较文化 - 文集 IV. ①G125 - 53
②G0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1410 号

文化传播与文明对话：跨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论集

WENHUA CHUANBO YU WENMING DUIHUA:

KUAWENHUA JIAOLIU YU BIJIAO YANJIU LUNJI

出版发行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政编码：510500 电话：(020) 87553335 http://www.gdgjs.com.cn
印 刷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 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22 千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前 言

《文化传播与文明对话》是我近年来在跨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领域探索的论文集。虽然每篇文章独立成篇，讨论的题目各有侧重，但所有论题都围绕着“文化传播”和“文明对话”这两个主题。大致来说，本书首先从单向的文化传播现象入手，进而探讨跨文化交流的模式，并以具体的个案来深入分析文化传播过程中发生的流变。其次，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考察了在两种文化中看似相似或表现各异的社会文化思潮、民间叙事和教育传统，探究这些文化表象背后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最后，从文明对话的价值立场出发，通过宏观阐释和具体实例讨论了文化之间的融合互补、相互影响和未来取向。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下面将分别做简要介绍。

第一部分的主题是文化传播，包含四篇文章。第一篇《从误解到理解：歌德与中国文化》在梳理歌德在文艺作品、对话录、日记和信件中对中国与中国文化接触、感受和理解的基础上，重构歌德接触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历程，并以 18—19 世纪中国文化在欧洲（德国）的传播和歌德独特的心路历程为背景，多侧面地探讨歌德接触中国与中国文化、理解和吸纳中国文化精神的阶段

性特征。第二篇《西方经典的误读与再读：对“格林童话”的历史文化解析》从格林童话的民间源流、口头性、民族性和传统色彩等四个层面，剖析传统研究对格林童话的误读内容，并从格林兄弟的生活经验、民族文化和国家危机等层面，探讨格林童话作为一种文化经典所蕴含的文化政治内涵。第三篇《接纳、赞颂与批判：跨文化交流模式》讨论了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人们对异域文化的态度常常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本篇以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中德文化间的欣赏、启发和批评现象的梳理，探讨对异域文化接纳、赞颂与批判的三种态度是如何呈现出来的。第四篇《源与流：西方故事与中国翻译》详细介绍了格林兄弟的人生历程和他们搜集、整理童话故事的经过，通过回溯格林童话的近代中译历程，分析了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特征。

第二部分的主题是中西比较，也包含四篇文章。《“发现民间”与“到民间去”：中德近代民间文艺运动的一种比较》是本书的第五篇论文。这篇论文比较了中德两场近代民间文艺运动。“发现民间”是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民间文艺运动的重要思想之一；“到民间去”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民间文学运动的思想口号之一。本篇论文在梳理这两场民间文艺运动发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中德近代民间理念在后续历史发展中的流变特征。在《童话传播的文化政治：论格林童话的德国生产与中国再生》一文中，探讨了童话传播背后的政治诉求所带来的推动力。格林童话是德国浪漫主义民间文艺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是格林兄弟面对

民族危机做出的一种文化努力，其中蕴含着为挽救民族危机而发现民间文艺的文化因子；近百年之后，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部分知识分子从格林童话的翻译和传播中解读出了这一信息，在近代民族文化危机时刻，推动新民运动深入到儿童教育层面，并掀起了到民间去搜集童话故事的运动。第七篇论文是《中西文明之火：夸父与普罗米修斯神话的一种比较》。虽然中国的“夸父”与希腊的“普罗米修斯”这两个神话的表层叙述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但是这两个产生于不同文化和思维背景的神话背后可能存在着相似或相同的神话模式和神话思维。本篇论文探讨了中国“夸父追日”神话与希腊“普罗米修斯”盗火英雄神话的类型关系，从而为理解古代中国和古希腊英雄神话背后神话模式和思维的基本特征提供思路。在第八篇论文《仁者与智者：中西方教育传统的不同与未来》中，讨论了中西方教育传统在教育性质、方法和原则上所具有的共通性和差异。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探析中西教育传统的不同，尝试解读未来生态文明教育的方向和内涵，或可为生态文明的研究提供一些新思路。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文明对话，同样也包含四篇文章。在第九篇论文《薪火相传，美美与共：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化》中，主要探讨了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中国崛起，中华文化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文中分析，当今世界全球文明冲突与对话的讨论日趋激烈，中华文化对内传承和对外传播的理念也需要应时而变。一方面，要薪火相传，真正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为中华文化向外传播提供源头活水；另一方面，要为解决全球问题和改善全球治理提

供中国智慧和思想，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第十篇论文《外来基因与内生动力：中西文化对话之一例》以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的近代中译为个案，分析上海在近代童话译介风潮中的重要地位，并从阅读需求、教育观念、出版机构、传播媒介和翻译主体等层面，探寻近代童话译介之风在上海形成的原因和特征。同时，结合特殊的历史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探究童话作为一种启蒙话语，对中国近代“新民”运动、儿童文学运动、民间文学运动和童话研究等文化和知识领域的价值和意义。第十一篇论文《天主教入华与中西教育通道》通过对明清以来珠澳地区几个重要的教育现象（如圣保禄学院、早期华人留欧、容闳与留美幼童）的考察，梳理天主教入华以来，珠澳地区作为早期中西教育通道所呈现的特点和产生的效应，探讨近代历史上珠澳一体的历史经验，为近年来颇受关注的珠澳一体化讨论提出教育先行的策略。第十二篇论文《高等教育与东亚儒学的未来》关注的是高等教育与东亚文明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文中谈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重要思想根基，特别在教育方面，更是中华诸子百家中最有贡献的；展望东亚文明的未来，需要推动高等教育与儒学之间的相互促进。

在这本书中，我努力实现以下几个目标：一是希望不拘泥于文学作品本身，尽可能地从开阔的视野来解读文化传播现象。以《格林童话》为例，这本是一个很小的着眼点，但却值得深入挖掘。《格林童话》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是西方翻译和传播领域仅次于《圣经》的世界文化经典之一。文中对格林童话的讨论，

就不仅把它看作是种艺术作品，而是作为一种多层面的文化复合体来进行分析。正是从社会政治思潮、文化发展史这样的视野来解读格林童话，在对格林童话的版本演变及其近代中译做出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拓展，如格林童话是“格林兄弟面对民族危机做出的一种文化努力”，“童话作为一种启蒙话语”等。

二是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来比较文化之间的异同。贯穿全书各个篇章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文化是深深根植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脉络中的，任何对文化传播现象的解析都必须回归到历史语境，这样对文化之间异同的认知才能深入。例如在《“发现民间”与“到民间去”：中德近代民间文艺运动的一种比较》这篇论文中，比较的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即前者是德国民族文化运动的一个支点，后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正是从这一认知出发，这篇论文从文化政治这个比较新颖的视角来探讨中德近代民间文艺运动的历史影响。

三是尝试从理论模式建构的诉求来探讨文化传播与文明之间的互动。这种追求体现在对纷繁的文化传播现象化繁就简的概括，也体现在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理解，探索未来发展的趋向。如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人们对异域文化的态度常常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通过对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考察，文中归纳了接纳、赞颂与批判这三种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以此来建构跨文化交流的一种态度模式。

本书在以上三个方面的探讨中存在诸多局限性，无论是知识

上，还是理论方法上，都尚有许多提升的空间。在以后的学术之路上，笔者将继续致力于文化传播与文明对话领域的探索，希望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未来能在资料搜集、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构三方面有新的突破和建树。

伍鸿宇

目 录

文化传播篇

从误解到理解：歌德与中国文化 / 3

西方经典的误读与再读：对“格林童话”的历史文化解析 / 28

接纳、赞颂与批判：跨文化交流模式 / 46

源与流：西方故事与中国翻译 / 67

中西比较篇

“发现民间”与“到民间去”：中德近代民间文艺运动的一种
比较 / 83

童话传播的文化政治：论格林童话的德国生产与中国再生 / 117

中西文明之火：夸父与普罗米修斯神话的一种比较 / 136

仁者与智者：中西方教育传统的不同与未来 / 151

文明对话篇

薪火相传，美美与共：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化 / 183

外来基因与内生动力：中西文化对话之一例 / 194

天主教入华与中西教育通道 / 257

高等教育与东亚儒学的未来 / 271

参 考 文 献 / 288

后 记 / 319

◇ | 文化传播篇 | ◇

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陆九渊《陆九渊集》

文化有一个特点：一旦产生，它就要传播，在民族内部传播，又传播到民族地区以外去，这就形成了文化交流。通过文化交流，民族间弃短取长，互相调剂，互相补充，把许多民族的智慧汇集在一起，又从而发扬光大之，才形成了今天世界上这种五彩缤纷、绚丽夺目的文化，使全人类皆蒙受其利。

——季羨林《中外文化交流漫谈》

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彼十八世纪西洋思潮潜流滋长，固为推动西方进步思想之根据。……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

——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从误解到理解：歌德与中国文化^[1]

一、引言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具有开放的文化品性，他不仅从尊重和理解人与文化的多样性出发，提出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概念^[2]，而且在实践中努力建构开阔的文化视野。正是这种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品性，使得歌德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创作出了贯通欧洲文化、融会东西方思想的许多经典作品。^[3]与波斯文学、印度史诗、罗马文学、塞尔维亚民歌和希腊民歌一样，中国文化对歌德的创作和思想也产生过重要影响，特别是中国文学、哲学、宗教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歌德的创作母题、审美内涵、语言张力和文化思维。尽管歌德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接触了中国与中国文化，他的一些理解有时并不全面，但由于歌德不仅是德国，而且是整个欧洲较早接触和理解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作家之一，他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接受对后来有中国倾向的德国和欧洲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4]所以，歌德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和理解不仅是他自身文化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德国（欧洲）后来其他作家理解东

方文化的基础。

歌德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德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德双方的学者坚持不懈地从中西方不同视角进行探讨和分析，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5]如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的论文《歌德与中国文化》^[6]、利奇温（Adolf Reichwein，1898—1944）在《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中的“歌德”部分^[7]、鲍吾刚（Wolfgang Bauer，1930—1997）的论文《歌德与中国：理解与误解》、瓦格纳·迪特玛（Christine Wagner-Dietmar）的论文《歌德与中国文学》、德博（Guenther Debon）的论文《歌德对中国的探寻》等；中国学者陈铨（1903—1969）在《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一书中的相关论述^[8]、杨武能（1938— ）的《歌德与中国》^[9]、卫茂平（1954— ）等人的论文《歌德中国观的变迁》^[10]、曹卫东（1968— ）的论文《论歌德的“中国主义”》^[11]等。毫无疑问，前人的这些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笔者认为，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研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遗憾，或者数据有待更新，或者分析有待更新，或者立论有失中允，或者论述散漫，因此很有必要对有关歌德接触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相关数据做系统的整理和客观性的分析。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系统整理歌德在文艺作品、对话录、日记和信件中对中国与中国文化接触、感受和理解的基础上，重构歌德接触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全过程，并以 18—19 世纪中国文化在欧洲（德国）的传播和歌德独特的心路历程为背景，多侧面地探讨歌德接触中国

与中国文化、理解和吸纳中国文化精神的阶段性特征。

二、接触中国与中华文化之过程

歌德接触中国与中华文化的过程虽然并不突出，但几乎长达一生。从儿时父亲房屋装饰的中国特色到老年有关中国作品的创作和研究，歌德对中国与中华文化的接触和理解经历了复杂的历程。

歌德从小成长的环境就富有一定的中国文化气息。^[12]由于当时欧洲“中国风”（Chinoiserie）刚刚过去，东方轿夫、丝绸服装、蓝白花瓶、油漆家具和茶叶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用品和物质在德国公共场所和家庭生活中并不鲜见。^[13]特别是歌德父亲当时崇尚中国文化，喜欢在家中书房和沙龙中布置中国装饰品，如精美的糊裱、精致的宝塔和精细的陶瓷等物品，导致很长一段时间里，歌德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停留在中国文化过于雕琢、缺乏自然性的印象上。^[14]

1770年春天歌德在病愈后，为了缓和当时与父亲的紧张关系，前往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继续修读在莱比锡（Leipzig）未完成的学业。在那里歌德至少阅读了用拉丁文翻译的《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等儒家经典作品。但是由于对中国文化的误解，歌德并没有因此理解中国儒家文化和思想，致使后来歌德对中国儒家文化和思想一直没有形成或培养为大的兴趣点。

1781年歌德阅读了一套北京传教士文集。该书共16册，于1776—1814年以法文陆续在巴黎出版。^[15]通过阅读这套书歌德获

得了有关中国的基本的地理、历史和文学知识。^[16]同年，歌德又进一步阅读了由法国耶稣会神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于 1735 年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17]该书共 4 册，1736 年以法文在巴黎出版，1747—1749 年被翻译成德语。通过这本书歌德接触和阅读到了中国戏剧《赵氏孤儿》、《诗经》中的十几首中国诗歌和《今古奇观》中的 4 篇小说。后来有学者认为歌德将《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融入他创作的戏剧《哀兰伯诺》中。^[18]

1794 年歌德从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那里借到一本由一名叫威尔金森（James Wilkinson, 1757—1825）的英国商人翻译，1761 年由珀西（Thomas Percy, 1729—1811）刊行的中国小说《好逑传》。这本小说于 1766 年由穆尔（Christoph Gottlieb von Murr, 1733—1811）翻译成德语。歌德阅读了这部小说^[19]，并与席勒在通信中有过讨论^[20]，在一定程度上歌德受到其一些影响^[21]。

1798 年是歌德接触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新起点。同年，歌德阅读了一篇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与一位道士的对话录。这篇对话录由弗兰西斯（Erasmus Francis）于 1671 年收编在他的 *Neupolierter Geschichts, Kunst-und Sittenspiegel auslaendischer Voelker* 一书之中。歌德当时被对话中的哲学和宗教思想所吸引，为此他在与席勒的通信中多次表达了阅读这篇“完美的哲学对话”的欣喜。通过阅读这篇对话录歌德发现了儒家思